《论集》注意到了老沙皇对我国侵略扩张的实质，并作了应有的揭露，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。但是，厄鲁特四部与沙皇俄国的关系，除了反抗其颠覆、渗透、蚕食、兼并的一面之外，也还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关系。在土尔扈特史的领域里，也应该揭示土尔扈特人民与顿河、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共同的利害关系。因为“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”，“数百年来，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”(《列宁全集》第21卷第392页、第3卷第38页)，渥巴锡领导的抗俄斗争是两年后普加巧夫起义的前奏，普加巧夫起义则是渥巴锡抗俄斗争的继续。充分地展示土尔扈特人民与俄国人民的关系，对于揭露沙皇政府凶残暴虐的统治实质和虚伪狡诈的卑劣伎俩，也是有利的，作者的论文中已开始这样做了，不过，在内容、分量、篇幅上，似乎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。

《论集》在技术上也有某些美中不足之处，有的文章注释重复较多，有的文章还残存着七十年代文风的痕迹。在内容上，有的问题还应进一步探索（如土尔扈特的回归路线）；有的碑文拓片选用后，对其中大满族主义的糟粕应在行文加以剔除。不过，这都是白璧微瑕，无伤大体。我们期待着作者继续开拓厄鲁特史的领域，为开发我国辽阔广袤的西北腹地，从历史研究上予以配合，提供新的专著或论集。

旅日学者杨启樵博士到历史所座谈

现执教于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的旅日华侨学者杨启樵博士，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邀请，自七月十二日起，来华作八周的学术访问，先后在北京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参观学术机构和与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杨启樵博士莅所与清史研究室的同仁们座谈，介绍了海外的清史研究状况，特别是台湾和日本的清史研究动态。他讲完后，与会者纷纷提出问题，气氛颇为热烈，历时两小时始散。

谈及台湾清史界的现状，杨启樵博士谦逊地说，《清史研究通讯》中多有报导，比如《台湾清史研究一瞥》一文中，就有详尽的叙述，毋须再作补充。然而，杨博士指出一点，台湾的印刷业比较发达，他们大量地影印和翻印史书典籍，虽然其中一部分出于商人的谋利心，且有粗制滥造的现象，但间接地助长了学术研究的发展。相形之下，内地的印刷缓慢，定期刊物多有脱期，这种情况亟待改善。

至于日本的汉学研究，杨启樵博士认为国内估价过高。实际上，日本学者的著作精粗不以，其中颇有不成熟的作品，读者不能囫囵吞枣，须仔细分辨。还有，日本学者不重视汉语，以致无法作深入的交流，这是一大缺点，但近年来颇有改进。以上是杨博士演讲的概略。

（梅岭）